

略论汉赋中的情爱表现

蔡彦峰

(厦门大学,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汉赋作为一代文学,受到《诗经》、《楚辞》所奠定的中国诗歌抒情传统的影响;虽然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意识对其多有压制,但汉赋仍不乏对情爱的表现;特别是汉代末期,它突破传统的观念,而具有人性解放的倾向。

关键词:汉赋;突破;情爱;人性解放

班固《两都赋》序谓:“赋者古诗之流也。”《汉书·艺文志》也说:“(赋)咸有恻隐古诗之义。”虽然班固主要是从赋的社会功能出发,但作为一代文学,赋显然受到《诗经》、《楚辞》所奠定的中国诗歌抒情传统的影响。刘勰《文心雕龙·诠赋》云:“赋者,受命于诗人,拓宇楚辞也。”因此即使在“铺采摘文,体物写志”的汉大赋占统治地位的时期,抒情赋仍然得到不断的发展,而这类抒情赋中,关于情爱的赋作占了不小的比重,在两汉经学盛行的环境下,这是一个值得令人思考的现象。

一、矛盾心理

《诗经》时代,对两性情爱的表述本无禁忌。《召南·草虫》“未见君子,忧心忡忡。亦既见止,亦既覯止,我心则降。”《周南·汝坟》“遵彼汝坟,伐其条枚。未见君子,惄如调饥。”非常直露地表达了对情爱的渴求,而在《诗经》中则不胜枚举。闻一多先生曾论述“鱼”和“欲”的关系。他认为《诗经》中“鱼”就是性欲的暗示,而像“未见君子,惄如调饥”则是性欲、食欲并提。《楚辞》对情爱的表现也仍然是相当自由的,如《离骚》中有三次求女;《九歌》中《湘君》、《湘夫人》、《山鬼》等篇更是表达了神与神、神与人之间会合无缘,情爱得不到满足的惆怅。但春秋战国时代自由的思想环境,随着西

汉的统一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社会需要统一的思想意识来适应其政治形势,因此武帝时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很快得到统治者的支持。大一统思想的确立对文学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诗经》、《楚辞》时代所表达的“情”、“欲”由于与时代的道德精神颇相违背而受到严厉的压抑和限制。班固《离骚序》评《楚辞》云:“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正,经义所裁。”大体可看出汉代经学对文学的巨大钳制力量。但人类基本的情爱需求,并非大一统思想及其诗教观所能够完全取代和压制的。“文化人类学和当代神话学等研究均已表明,阴阳两性的意识广泛而深刻地存留在初民的头脑中。而人生理性的本能冲动也正是男女相思的深在动力源。”因此,在汉赋中仍不乏对情爱的表现。请看表 1:

从表 1 可以看出情爱美色赋在汉代的分布情况。如果把两汉作为一个整体来分析,以汉安帝(公元 107—126)为分界线,作为汉代的中前期,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三百多年间产生的情爱赋还远不如汉代后期一百多年间的数量。再严格一点的说,汉代中前期真正可称为情爱赋的只有区区的五篇,即司马相如《美人赋》、《长门赋》,汉武帝刘彻《李夫人赋》,班婕妤《自悼赋》和张衡《定情赋》,表中其他的赋作虽然也都涉及到情爱或美色的描写,但由于它们只作为赋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不占

作者简介:蔡彦峰,厦门大学中文系研究生。

作者	作者创作活动的主要时期	赋题	有否出现梦境	情爱类型	描写角度
枚乘	汉景帝到武帝时期	七发		*	男
司马相如	汉景帝到武帝时期	子虚赋		*	男
		上林赋		*	男
		大人赋		人神	男
		美人赋		常人	女
		长门赋	有	帝妃	女
刘彻	汉武帝	李夫人赋	有	帝妃	男
班婕妤	汉成帝	自悼赋		帝妃	女
傅毅	汉明帝到汉和帝	舞赋		*	男
		七激		*	男
崔骃	汉和帝	七依		*	男
张衡	汉和帝和汉顺帝	思玄赋		人神	男
		定情赋		常人	男
		七辩		*	男
王逸	汉顺帝	机妇赋		*	男
边让	汉桓帝到汉献帝	章华台赋		*	男
蔡邕	汉桓帝到汉献帝	青衣赋		常人	男
		协和婚赋		常人	男
		协初赋		常人	男
		检逸赋	有	常人	男
阮瑀	汉献帝	止欲赋	有	常人	男
徐干	汉献帝	嘉梦赋	有	人神	男
		七喻		*	男
繁钦	汉献帝	弭愁赋		常人	男
杨修	汉献帝	神女赋	有	人神	男
王璨	汉献帝	神女赋		人神	男
		闲邪赋	有	常人	男
		七释		*	男
陈琳	汉献帝	神女赋		人神	男
		迷迭赋		*	男
		止欲赋	有	常人	男
应玚	汉献帝	正情赋		常人	男
		神女赋		*	男

主导地位,因此,不能归为情爱赋。而仅汉代后期完整的情爱赋就达 11 篇,分别是蔡邕《青衣赋》、《协初赋》、《检逸赋》,阮瑀《止欲赋》,繁钦《弭愁赋》,杨修《神女赋》,王粲《神女赋》、《闲邪赋》,陈琳《神女赋》、《止欲赋》,应瑒《正情赋》。从表 1 我们也可以发现从汉武帝《李夫人赋》到班婕妤《自悼赋》,其间一百来年,竟再无一篇赋作涉及情爱与美色的表现。如果再考虑到这两个人特殊的身份,即一个是帝王,一个是后妃,他们表达情爱本就较少受到限制,那么,可以说从枚乘到汉章帝时的傅毅,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内,普通的文人的赋中就没有再涉及到情爱美色的描写,这不能不说是相当反常的。这种情况的出现与社会思想的控制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先来看看这时期的社会思想。公元前 141 年,在提倡黄老思想的窦太后(文帝之妻,景帝之母)逝世之前就有人呈上奏折,谴责有法家思想的人。公元前 136 年,国家规定博士应指定五人专治“五经”,即《易经》、《尚书》、《诗经》、《礼》和《春秋》,后来又增添了《乐》。这些著作大体涉及伦理思想,是儒家思想最重要的标志。公元前 134 年,武帝策贤良文学之士,董仲舒上对策三篇,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武帝所采纳,大一统思想开始确立,今文经学家董仲舒在他的《贤良文学对策》中进一步提出其经学思想,云:“天令之谓命,命非圣人行;质朴之谓性,性非教不成;人欲之谓情,情非制度不节。是故王者上谨承于天意,以顺命也;下务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别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举矣。”董仲舒认为只有以纲常伦理来节制人民的情欲,才能维护国家的稳定。在这种经学思想的桎梏下,汉代诗教观特别突出,《礼记·孔子闲居》云:“诗之所至,礼亦至焉。”而《毛诗序》则明显地贯穿着一个中心思想,“诗歌必须为统治阶级的政治服务。因此,在谈到诗歌的言情特点时,提倡‘发乎性情,止乎礼仪’。说到诗的政治作用时,又强调‘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它把这种思想集中突出地表现在诗歌的社会作用的论述里:‘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这种理论在政治上表达了统治阶级对诗歌的要求,在思想上则是《论语》是‘思无邪’兴、观、群、怨、事君事父说的进一步发展。”这种“温柔敦厚”的诗教

观影响十分长远深刻,它超越了诗歌范围,成为汉代文学创作和批评的准则,极大地限制了文学作品对情感的抒发。这是汉代中前期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情爱赋缺席的重要原因。从表 1 我们也可以发现,作为“汉赋四大家”的扬雄、班固都没有这方面的作品,这也与他们作为正统文人,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有很大关系。对汉代来说,“大一统思想”的确立,显然符合其中央集权的政治形势的需要;为了使这种思想得以贯彻,也相应地对个体的人作出了多方面的限制,“我们文明程度的提高或进展是以牺牲幸福为代价的。”这种代价包括了对男女情爱的自由表达的限制,正如上文提到的,《诗经》和《楚辞》时代对情爱的无禁忌,在汉代已不大可能看到。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在汉代“节情”、“防欲”的思想观念下,汉赋在对情爱的表现时,隐含了赋家相当矛盾的心理。

一方面,赋家要抒发自己的情爱欲望;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得不考虑社会伦理道德的规范。如司马相如的《美人赋》,赋人大肆渲染女子的美貌,其东邻之女“云发丰艳,蛾眉皓齿。颜盛色茂,景耀光起。”而且对“我”苦苦相恋,“登垣而望臣,三年于兹矣。”相如却“弃而不许”;后来相如路过郑卫之地,遇到了上宫闲馆独处的女子,此女“奇葩逸丽,淑质艳光”,女子深闺独处,寂寞无依,恐年华老去,见远方公子遂大胆求爱,先以歌声挑逗“独处室兮郭无依,思佳人兮情悲伤。有美人兮来何迟,日既暮兮颜色衰,敢托身兮长自私”,继而“玉钗挂臣冠,罗袖拂臣衣”,“寝具既设,衽褥垂陈,角枕横施。女乃驰其上服,表其褻衣,时来亲臣”。一方面直露地表现了女性对情爱的渴求,另一方面却又极力将自己纳于礼的范围之内,“气服于内,心正于怀,信誓旦旦,秉志不回,翻然高举,与彼长辞”,从而试图证明自己“不好色”,“坐怀不乱”的正人君子之美德,因此,两位女子对情爱率直、热烈的追求,在赋中也就以反面的形式出现,成了被批判、被否定的对象,这符合社会伦理道德的要求,却违反了基本的人性。前人早已看出了破绽,《骚赋部杂录》云:“司马相如拟《讽赋》而作《美人赋》,亦为臣不好色,则人知其为诬也。有不好色而能盗取文君者乎?此可发千载之一笑。”又李调元《赋话》:“司马长卿素有消渴疾,及返成都,悦文君之色,遂发痼疾,乃作《美人赋》,欲以自

制,而终不能改。”赋中对情爱的表现才是作者的真本意,只是在封建社会的巨大压力下,不得不以曲折的方式来进行。司马相如也罢,其他赋家也罢,他们至少必须在形式上对社会伦理表示一点妥协。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和齐、梁时直接以

“丽色”、“丽人”、“秋思”命题不同,汉赋作者往往借“闲情”、“止欲”、“正情”为幌子。他们毕竟还不敢对儒家的道德伦理公然表示反叛,还须借助了一个幌子来保护自己,这恰恰体现了他们现实的矛盾心理。

楚辞			汉赋				
所求女	方法	结局	作者	赋题	所求女	方法	结局
宓妃	令騫修为理	虽信美而无礼,来违弃而该求。	司马相如	大人赋	玉女	自求	载而与之归
有娥之逸佚女	令鸩为媒	欲远集而所止,聊浮游以逍遥。	张衡	思玄赋	玉女宓妃	自求	双材悲于不纳
有虞之二姚	理、媒导言	理弱而媒拙兮,恐导言之不固。	杨修	神女赋	玄媛逸女	感梦而通灵	色欢悻而我从
			王璨	神女赋	天丽神人	自求	回意而自绝
			陈琳	神女赋	神女	托梦通灵	顺乾坤以成性

二、对传统观念的突破

人类的情爱要求,作为一种本能,事实上不能被长久地压抑,它必定会通过各种途径加以表达,包括文学上的抒发。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认为:“人的性本能冲动构成了文化和社会文明的基本动力。”^⑩社会文明的发展也必须导致人们情爱观念的进步,因此,汉赋对情爱的描写明显表现出了与前代的不同点在于它具有人性解放的倾向,在实质上体现了对传统观念的一定突破。请看表2—汉赋和《楚辞》关于求女的对照表:

从表2我们可以看出,与《离骚》中求女需要媒介不同,汉赋中男女可以直接交流。这种交往方式自然不合礼法,但却顺应了人情,同时作为一种文学传统,我们看到它在后代得到普遍的认同和继承。虽然汉赋这种求女,也出现以礼自防而使男女交往最后以失败告终的,但汉赋中似乎并没有因为礼法的限制,而表现出过多的畏怯。《诗经·郑风·将仲子》描述了一个女子因为害怕外界舆论力量,而拒绝相爱的男子到她家后园相会的要求,这种对礼法的畏惧,在汉赋中再也没有出

现,不能不视为一种进步。

特别是在汉末,礼法制度的崩坏,为情爱表现提供了相对广阔的空间,汉赋对传统观念的突破在此时也表现得更为明显,常常突破赋作题目的限制,大胆抒发对情爱的渴求。陶渊明《闲情赋》序云:“初,张衡作《定情赋》,蔡邕作《静情赋》。检逸而宗淡泊,始则荡以思虑,而终归闲正。将以抑流宕之邪心,谅有助于讽谏。缀文之士,奕代继作。并因触类,广其辞义。”^⑪但是果真如此吗?《定情赋》云:“夫何妖女之淑丽,光华艳而秀容。断当时而呈美,冠朋匹而无双。”丝毫无归于“闲正”的意思,作者赞叹的是女子的淑丽和光艳,忧愁的是美人年华老去,自己无法及时与之遇合“大火流兮草虫鸣,繁霜降兮草木零。秋为期兮时已征,思美人兮愁屏营。”几乎是其《四愁诗》的翻版,它表达的恰恰是对情爱的追求。蔡邕《检逸赋》顾名思义乃是要防止淫逸之思,但他却在赋中大喊:“余心悦于淑丽,爱独结而未并,情罔写而无主,意徙倚而左倾。”“思在口而为簧鸣,哀声独而不敢聆。”而其它那些“止欲”、“正情”的作品,也恰恰是在抒发作者自己的情爱欲望,以及情爱欲望无法得到满足时的悲伤之感。这些赋有一个共同特

点,即都有了大量的篇幅来描绘所思念的女子外貌美,如“夫何淑女之佳丽,颜眩眩以流光。历千代其无匹,超古今而特章。”(阮瑀《止欲赋》)“夫何英媛之丽女,貌眩美而艳逸。横四海而无仇,超遐世而秀出。”(王粲《闲邪赋》)但与汉初司马相如违心拒绝不同,汉末这些赋家在描绘其充满想象力的、近乎完美的女性后,大胆的表达了对她们的爱恋,“余情悦其美丽,无须臾而有忘。思桃夭之所宜,愿无衣之同裳。”(阮瑀《止欲赋》)“伊余情之是悦,志荒溢而倾移。宵炯炯以不寐,昼舍食而忘饥。叹此女之好我,美携手之同归。”(陈琳《止欲赋》),这种相思极为强烈,甚至到了夜不成寐、舍食忘饥的程度,因而似乎忘记了他们讽谏的责任,口无遮拦地表达了积压在他们心中的情爱欲望。鲁迅先生评陶渊明《闲情赋》云“……竟想摇身一变化为啊呀呀,我的爱人呀的鞋子,虽然后来自说因为止于礼义,未能进攻到底,但那胡思乱想的自由,究竟是大胆的。”^⑩“大胆”这两个字大体上也是可以用来评论这些汉末赋家的作品的。

汉末情爱赋对传统观念突破的另一,表现在赋家对女性的态度的转变上。汉初的赋家在描写女性美时都将之视为负面景观,如司马相如《上林赋》在“青琴宓妃之徒”出场发挥“色授魂与”的魅力后,“天子茫然而有思,似若有亡”,而改弦易张。《美人赋》也在渲染女子的艳丽之后,转而说自己“气服于内,心正于怀,信誓旦旦,秉志不回,翻然高举,与彼长辞”。而汉末的赋家则与此有很大不同,他们对女性美明显持肯定的态度,甚至试图对情爱的合理性加以肯定。如蔡邕《协和婚赋》云:“惟性情之至好,欢莫伟乎夫妇”,虽然是从人类繁衍的角度来肯定婚姻,但也包含了对男女情爱合理性的肯定。陈琳《神女赋》则干脆说男女情爱是“顺乾坤以成性”。灵帝时张超作《诮青衣赋》对蔡邕严加驳难指斥,“彼何人斯,悦此艳姿。丽辞美誉,雅句斐斐。文则可嘉,志鄙意微。”从反对者的激烈言辞,更可看出汉末情爱赋对当时社会传统观念巨大的冲击力。

三、梦与相思焦虑

“中国有句古话说得好‘情人眼里出西施’。但这位美女‘西施’(或美男‘潘安’)若真的朝朝暮

暮在眼前,便很难做到相看两不厌,保持相敬如宾;而分隔,却会使得彼此之间(或一方对另一方)的价值得到明显的提升,以至相思对象的特定角色在情人眼里变得近乎完美无缺,越想越可爱。所以,传统抒情文学偏重点在描写相思情感的焦虑与想象期盼。^⑪汉赋对情爱的表现也明显的通过男女之间强烈的相思焦虑感来加以传达。在早期的这类汉赋中,相思往往具有具体的指象。如司马相如《长门赋》,其序云:“孝武陈皇后,时得幸,颇妒,别在长门宫,愁闷悲思,闻蜀郡成都司马相如天下工为文,奉黄金百斤为相如文君取酒,因干解悲愁之辞。”^⑫明确地指明了相思的对象。《自悼赋》据《汉书·外戚传》说,班婕妤以贤淑得宠,后“赵氏姐妹嫉妒,婕妤恐久见危,求供养太后长信宫,上许焉。婕妤退处东宫,作赋自悼。”这两篇赋大体上属于弃妇辞,表达了失宠后妃对君王爱情的渴求,她们相思的对象都很具体。汉武帝《李夫人赋》所表达的也只是对自己去世的后妃深切的思念。这些赋对情爱的渴求无可怀疑,但由于情爱双方的特殊关系(即帝王与后妃),因此这种情爱表现的局限性也就十分明显,它所代表的只是极为特殊的一部分人。在两汉中前期,除了上述的三篇和司马相如的《美人赋》,以及一些君王田猎、游宴的散体大赋中偶尔出现“郑女曼姬”,“青琴宓妃”与帝王有关的男女之情的描写之外,文人作品中几乎再看不到对情爱的表现,这种不正常的现象说明了大一统思想确立之后,儒家伦理道德对情感的强烈压制,而这又恰恰是造成汉赋中强烈相思焦虑感的客观社会因素。

两汉中前期,中国古代相思之作虽然受过阶段性的遏制和扭曲,却不能成为其精神价值和艺术魅力未得以充分发掘的理由。汉末随着思想控制的松动,所产生的大量相思之作,进而对情爱观念的突破,正说明了这一点。这时期表现情爱的赋作,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首先,是普通的文人加入到这一写作领域,并产生了大量的作品,如张衡、蔡邕、杨修、王粲、陈琳等人,他们的作品占了整个汉赋情爱类作品的近 80%,可见这一创作领域的繁荣;其次,是赋中情爱指象的抽象化,赋中相思的对方常常是一个抽象的抒发对象,从这一点来说情爱表现具备了更为普遍的意义;再次,赋中情爱表现得更为直率,而同时相思的焦虑感也

变得更为强烈。如蔡邕《协初赋》云：“长枕横施，大被竟床。莞柔和软，茵被调良。粉黛施落，发乱钗脱。”已是很直露的性爱描写。《青衣赋》则坦言自己对一个下层婢女的爱恋，这个婢女“盼倩淑丽，皓齿峨眉。玄发光润，领如螭螭。……”总之在其看来是“世之鲜希”、“宜作夫人，为众女师”，接着又写到对她深切的思念“南瞻井柳，仰观斗机。非彼牛女，隔于河汉。思尔念尔，怒焉且饥。”毫不避讳对性饥渴的表示。蔡邕之后，汉末的其他赋家仍热衷于在赋中来表现他们的情爱欲望，但这些赋中情爱对象的抽象化更为明显：一方面，赋中的女性往往以理想化、完美无缺的形象出现，如陈琳《止欲赋》，“媛哉逸女，在余东滨。色曜春华，艳过硕人。乃遂古其寡俦，固当世之无邻。”另一方面，则是神女系列的出现，杨修、王粲、陈琳、应玚诸人都有同题的《神女赋》。实际上两者之间其实并无太大的区别，不管把爱人想象为完美无缺的形象，还是神女，都是赋家对情爱理想化的、美好的期盼。但在如何实现这种想象期盼上，赋家似乎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因为社会毕竟还没有提供自由实现两性情爱的环境，儒家思想的衰弱也远没有达到人们可以自由表达情爱的地步，因此，赋家往往采用梦幻的形式，在梦境达到两性的结合。据笔者的初步统计，《全汉赋》所录有关情爱的三十篇赋中，直接写到梦的就有十篇（见表1），分别是司马相如《长门赋》、汉武帝《李夫人赋》、蔡邕《检逸赋》、阮禹《止欲赋》、杨修《神女赋》、王粲《闲情赋》、陈琳《神女赋》、《止欲赋》、和应玚《正情赋》，不包括徐干仅存序文的《嘉梦赋》，（从序文来看此篇也明显写到梦）。如“昼骋情以舒爱，夜托梦以交灵”（蔡邕《检逸赋》），“还伏枕以求寐，庶通梦而交灵”（阮禹《止欲赋》）。弗洛伊德说：“幸福的人从来不去幻想，幻想是那些愿望未得满足的人心中生出来。换言之，未满足的愿望是造成幻想的推动力，每一个独立的幻想都意味着某个愿望的实现。或意味着对某种令人不满意的现实的改进。”弗洛伊德又认为：“夜梦同上述幻想是同一回事。”^⑬因此，我们认为梦在赋中的出现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对情爱的强烈渴求；另一方面，则不排除是赋家采取的一种自我保护方式，以避免同道德伦理的正面冲突。但赋家一旦在将

这种梦境落到实处时，就会遇到非常现实的困难，从而产生强烈的焦虑感。“大概地说，这个词（焦虑）常用来指知觉危险时所引起的主观状态，这种状态称为情感。”“怀纤结而不畅兮，魂一夕而九翔。”（阮禹《止欲赋》），“恨年岁之方暮，哀独立而无依。情纷絮以交横，意惨凄而增悲。何性命之奇薄，爱两绝而俱违。”“目炯炯而不寐，心怵怵而惕惊。”（王粲《闲邪赋》）“在任何一个民族里，对性活动的限制，都会大大增加人们对生存焦虑感和死亡的惧怕感。”^⑭可见这种焦虑源于现实对情爱的严格限制，当然也不排除这种焦虑也蕴含着作者某种寄托。

[责任编辑：李建国]

注：

①《文选》，（梁）萧统编，（唐）李善注，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页。

②《文心雕龙注疏》，刘勰著，周振甫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80页。

③《古代相思文学中的两性情欲表现》，王立，载《性别诗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360页。

④本文所引用的汉赋资料皆见于，费振刚、胡双宝、宗明华辑较的《全汉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⑤《贤良文学对策》，董仲舒著，见《汉书董仲舒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

⑥《中国历代文论选》，郭邵虞、王文生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35页；282页。

⑦《弗洛伊德爱欲论》，艾布拉姆森著，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8页。

⑧见《古今图书集成》。

⑨《赋话》卷七，李调元著，见《丛书集成》。

⑩《精神分析引论》弗洛伊德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8页。

⑪《陶渊明集全译》，郭维森，包景诚译注，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74页。

⑫《且介亭杂文二集 题未定草（六）》，鲁迅著，见《鲁迅杂文全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33页。

⑬《古代相思文学中的两性情欲表现》，王立，载《性别诗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367页。

⑭《文选》，（梁）萧统编，（唐）李善注，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712页。

⑮《精神分析引论》，弗洛伊德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69、171页。

⑯《弗洛伊德爱欲论》，艾布拉姆森，著，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8页。